



社会市场经济之路

[德] 路德维希·艾哈德 著

LUDWIG ERHARD

丁安新 译

武汉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田 原 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10月）

（1992年10月）

社会市场经济之路

〔德〕路德维希·艾哈德 著
丁安新 译

CDIV/14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德)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著;丁安新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5

ISBN 7-307-02518-3

I 社…

II ①(德)艾哈德… ②丁…

III ①艾哈德, L—经济思想—文集 ②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研究

IV F095.18 F151.80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武汉大学印刷厂印刷

(430072 武汉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插页:1

字数:237千字 印数:1—1000

ISBN 7-307-02518-3/F·551 定价:12.5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Ludwig Erhard
Gedanken aus
fünf Jahrzehnten
Reden und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Karl Hohmann

Copyright © 1988 by ECON Verlag GmbH,
Düsseldorf, Wien und New York

选译自德国埃孔出版社 1988 年版
路德维希·艾哈德：50 年思想集锦
主编：卡尔·霍曼

德国路德维希·艾哈德基金会赞助出版
德国埃孔出版社授予汉译版权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奥托·施莱希特 (1)
紧急措施	
《日记》周刊, 1931 年	(3)
战时财政与债务清理	
《意见书》, 1943/1944 年, 结束章, 1944 年 3 月	(12)
除旧迎新	
《新报》, 1945 年 12 月 31 日	(17)
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	
《新报》, 1946 年 10 月 14 日	(18)
国民经济各项任务的排列	
《新报》, 1947 年 8 月 18 日和 22 日	(22)
未来之路	
在联合经济区经济委员会第 14 次全会上的报告	
1948 年 4 月 21 日于法兰克福	(27)
新航向	
电台讲话, 1948 年 6 月 21 日	(49)
挽救空洞教条的总罢工	
电台讲话, 1948 年 11 月 11 日	(56)
从经济政策角度看卡特尔组织	

《经济师》，1949年12月16日	(60)
用勇气和力量迎接未来	
“1950年德国工业展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1950年10月1日于柏林	(66)
经济政策的胜利	
《法兰克福汇报》，1951年12月31日	(70)
从欧洲政策的角度看德国的经济政策	
在瑞士外国问题研究所的报告，1952年2月6日于苏黎世	(73)
健康外贸工作的思想基础	
《德国重返世界市场》的前言，1953年	(92)
为反卡特法辩护的10个要点	
给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弗里茨·贝格的一封公开信	
1952年7月10日	(97)
社会市场经济的第二阶段	
《工业信使》，1953年6月20日	(105)
企业家、国家和经济	
德国工业联合会会员例会上的报告 1954年5月17日于埃森 ...	(109)
关于工作时间问题	
《彩图》月刊，1955年5月	(117)
一项经济戒律	
电台广播讲话，1955年9月7日	(119)
对社会生活风险要未雨绸缪	
《保险业》杂志，1956年1月号	(124)
社会市场经济与物质享受	
《星期日快报》，1956年1月29日	(129)
经济与教育	
《经济师》，1957年8月17日	(134)
让国家履行国家的职责	
《时代》周刊，1957年11月21日	(138)

印度的建设

在印度国际事务委员会的报告，新德里，1958年10月7日 … (142)

德国马克可自由兑换

广播讲话，1958年12月28日 …… (148)

日本的经济问题之我见

《外交政策》，1959年7月 …… (150)

1929—1959年的经济政策 30年

(意)《道路》月刊，第12期，1959年12月 …… (154)

经济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部分

在基民盟第九次全国党代会上的报告

卡尔斯鲁厄，1960年4月28日 …… (160)

经济政策中的战略与战术

《法兰克福汇报》，1960年12月3日 …… (175)

昨天—今天—明天

《电气实验室唱片》录音，1961年6月9日 …… (179)

经济、社会和文化

同名的缪勒尔—阿尔玛克纪念文集的前言，柏林，1961年 …… (197)

德国的经济政策

前言，1962年2月 …… (201)

弗兰茨·奥本海默，我的良师益友

柏林自由大学庆祝奥本海默百年华诞纪念会上的报告

1964年4月30日 …… (209)

组合社会

基民盟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杜塞尔多夫，1965年3月31日 …… (216)

现代政治中的经济与经济秩序

为《雅克·瑞夫纪念文集》而作，1966年6月6日 …… (22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昨天和今天

为《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经济与财政政策》而作，1967年 ……

… (236)

市场经济中的秩序思想

为路德维希·冯·米瑟斯 90 华诞纪念册而作, 1971 年 (246)

社会市场经济迎接我们时代的挑战

为《社会市场经济》一书而作, 1972 年 (258)

社会市场经济——现在就到位!

为《联邦德国经济及其领袖人物》一书而作, 1975 年 (266)

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按照统一原则建立秩序的经济制度

1976 年 (272)

生平大事记 (275)

译后记 (287)

中文版序言

奥托·施莱希特^①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经济部长和第二位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不仅在战后的德国在政治上新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秩序，而且还是这种自由秩序的理论奠基人之一。他在专业杂志上或大众报刊上发表论文和讲话，从而积极地影响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建构和发展。他数十年劳动的重要成果现在又通过这个中译本展现在大家面前。

这些文章阐述了社会市场经济秩序思想的根源和基础，总结了它的建立和发展，其中包括失误和校正，还指出了市场经济政策在德国和欧洲的发展前景。这些论述还超越地理的限制，对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也会有所帮助。

中国推行了分散的企业决策和消费决定、私有化和非集体化^②，这样就为市场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从长远来看，政治体制和组织机构也不得不适应市场迅猛发展的要求而发生变革。

作为多年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的实践者和艾哈德基金会的创

① 施莱希特 生于1925年，艾哈德基金会现任主席，曾就读于德国弗赖堡大学经济系并获博士学位，1953—1991年任联邦经济部官员，1973年起任国务秘书。发表了大量有关经济政策的论述。——译者

② 按照德国的经济理论，私有化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私有化包括改建股份公司，成立控股公司，实行国有企业租赁制，甚至包括反垄断或促进竞争的一系列举措。——译者

立人(1967年),艾哈德深知秩序政策在社会和政治上站稳脚跟的艰难。虽然在有社会责任的市场经济中,在开创生存条件时或者进行结构调整时以及类似情况下,国家的援助是合法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家难以适时抓住重点:避免采取国家干预和调控而抓住投资环境的改善和企业家的积极参与。经验还告诉我们,虽然社会市场经济可以大量采用和强化这种干预,但是秩序政治家必须时刻牢记有一种危险,即这种干预的日积月累不仅造成体制逐渐僵化,经济活力衰退以及经济矛盾和摩擦更为尖锐,而且还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经济体制发生质变。

正是这种后来在德国发生的而艾哈德早就警告要防止的变化可以作为中国转轨的教训。另外,出版这本书的用意也并不是要把德国的秩序模式一丝不苟地照搬到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的充满活力的秩序,它可以而且必须继续发展并且迎接新的挑战 and 适应新的环境。

因此,这本书应该可以指明如何巩固和发展符合艾哈德思想的市场经济秩序。如果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得到落实,那么这些国家也将会把艾哈德实现“大众的福利”的理想变成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我作为艾哈德基金会的主席而祝愿中国在向市场经济秩序转轨过程中取得成功并且坚持不懈!

紧 急 措 施

《日记》周刊，1931 年

(按语)① 艾哈德，纽伦堡商学院经济观察研究所当时的助教用发表在柏林的周刊《日记》上的这篇文章向广大读者介绍他克服经济危机的思想。此文是艾哈德的第一篇公开的政治观点。当时的总理布鲁宁靠紧急条例来维持政权；大银行纷纷倒闭，其他的银行也得依赖中央政府的支持；500 万至 600 万失业大军加剧了群众的政治极端化倾向；所有迹象表明经济生活将进一步恶化，全面萧条的危险紧急万分。工业生产跌落到 1913 年的水平。在这种形势下，公开的讨论充满自相矛盾的拯救经济的计划。艾哈德的计划“紧急措施”要求推出一种特殊的转账支票货币，以便给经济注入更大的支付能力。创造一种“新式的无现金的货币”的这个建议是针对其他的计划而提出来的，那些计划中提出的提高贴现率只会加剧通货紧缩的压力。在这种严重危机的形势下，艾哈德要求：货币政策措施必须有助于经济好转，而且也只有明确地针对这个目标才是可取的。

艾哈德在 30 年以后又肯定这个对时局的评价。在回顾那个年代时，艾哈德说（见本书《昨天—今天—明天》，1961 年 6 月 9

① “按语”均为原书的主编、艾哈德生前的亲密助手卡尔·霍曼博士所加，少数几个“译者按”是译者所加，主要介绍当时的背景，以利于读者理解。——译者

日)，布鲁宁总理当时耽误了时机，没有采用“凯恩斯人为地创造购买力的理论”。这曾是“防止和扭转通货紧缩过程最好的办法”。

但是由此断定艾哈德是凯恩斯的无条件的信徒，那也是错误的。艾哈德明确限定凯恩斯的观点，说“只有在这个时刻”应用凯恩斯理论才是正确的。

根据近几周的现象来看，我们过于倾向于仅仅就当前的货币政策问题，甚至纯货币技术问题来观察全国经济形势。《日记》周刊的贡献在于让对纯学术或商学并不感兴趣的读者也能了解货币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而且是在我国的货币储备还多出数10亿的时候，亦即在经济和货币技术措施的可能性还依然存在并且有望获得唾手可得和更巨大的成就的时候。诚然，很多这样的机会错过了。但是我国经济的根基还不致于因为近几周流水般的资本流失而动摇到我们只能望洋兴叹。我们经济的生产力，可以理解为技术设备，还没有改变，而且使用这种工具的劳动力遗憾的是太多了。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困难，即实际和人力生产要素，换言之是资本和劳动，组合成一个和谐运行的整体，纳入一种完美的机制之中，这件事还毫无进展并且超越一时的需求而成为我们时代的忧患。如果我们现在就必须着手医治某些症状，那么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个伟大的越时代的观点而且明确认识到，货币环境所需的技术组织任务的完成只能为普遍经济社会形势的好转打下基础。

保护货币的紧急条例从短期眼光看来，还是可以实行的。但是德国舆论现在一致认为，必须取消这种仅仅用作权宜之计的紧缩方针并且加速将支付往来转入有序的轨道。仅仅按部就班地以若干个百分点增加提取现金和实行划汇，按这种方式实现松动，当然不足以保障一个分工十分发达的现代经济体之显然受到严重抑制的生产。基于清楚和理智地认识到，我们绝对不能继续执行现

有的政策，直到我们在若干个星期或月份之后能够又得到一笔外国贷款，所以现在就应该想出办法和途径，按照经济要求的规模而不是货币技术极限来给社会生活提供技术手段——货币与信贷。

那么这种大胆之举是否与脱离金本位同等重要呢？答案不能简单地归为一个统一的公式。

以目前约 15 亿帝国马克的偿还基数为基础，最大货币流通量就在 37.5 至 50 亿之间的 30%~40% 的偿还极限内摆动。如果扣除其中相当大的囤积货币金额，那么剩下的总货币流通量按照现行支付习惯根据经验还不足以即使是按照现有工业生产能力来满足商品生产和分配。在保持 30% 至 40% 偿还的这种信贷与货币条件下，经济发展当然是根本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金本位的存在被视为我国货币政策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现在可以随意去思考这种体制：只有当我们倾最后的黄金储备至少可以偿还外国的短期债务时，德国在当前的形势下退出金本位联合会才是合情合理的，这样想在目前的确是正确的。否则，国际信誉的损失大概是很大的，以至使我国的资本市场会因为解约增加而受到更大的压力，从而使我国工业更加依赖外资。在现在的运行情况下，金本位也确实至少在一定的时候还是有用的，即当黄金作为缓冲器至今尚能抵御外国伸进德国生产资本时。

如果形而上学的信念赋给金本位以一种特性，即只有与黄金准备相联系才能保证货币的价值或购买力，而且唯有如此才能克服通货膨胀的危险，那么金本位也就失掉其意义了。用这种方式，一种贤明的体制也会成为所有全国经济联合会的攻击对象。如果人们用自己的手采取这样专横的方式给自己套上枷锁，那么这并不证明对现代货币形势和经济关系有深刻的认识，甚至可以说仅仅由于缺乏勇气而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德国现在还不能够自动发起就在这个时候突破神圣不可侵犯的金本位制，而且如果我们由于上述考虑认为目前完全脱离金本位是不明智，甚至是危险

的，那么这就为我们采取政治行动确定了初步的限制。

如果有人因为信贷谈判失败而对我们高喊“我们必须首先适应我们自己的环境”，那么这肯定是对的，只要这时可能考虑到生产与消费的比例而且好转的财政收支可以满足要求。但是这一切却一无所有。俗语“适应环境”用实际上唯一可能的解释来说就是适应金本位的环境，而这又是经济上的天大笑话。我们今天就处于这个地步。

大讨论逐步得出一个计划：国家银行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并不加限制的额度满足向银行提出的要求并且为此目的而动用一切手段（包括加印钞票），而不顾及货币流通的黄金准备。这时应该而且可能是必须提高贴现率到一定程度，使贴现信贷的接受不大吸引人，甚至还吓人。哈恩、卡塞尔和洛甫克^①等人首先在《法兰克福日报》上宣传的这个计划坚持了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是最轻易可得的而且也肯定优于紧缩体制、定额分配和所有其他限制流通的措施。从其作用来看，这种计划相当接近耶稣教义。人们引经据典地说，经济在当前货币与信贷短缺的情况下不再能够完成其功能，因而必须让货币与信贷市场经受老生常谈的各种力量自由竞争。但是同时进入市场又被搞得极其困难，以至自由基本上还仅仅作理论上的可能性而停留在书本上。现在用这么大方的姿态恢复的自由却在物质上因为经济上的货币困难而变化甚微或毫无变化。除了自由支配现有资金的可能性之外，未来的生产与销售筹资都同样受到损害。资本雄厚和筹资渠道畅通而不急需这种信贷的企业还可以承受这种严厉措施，而这对许多企业来说的确是难以接受的成本，但是对相当数量的其他企业而言，高价信贷还不失为挽救必然彻底破产的命运的救星。

^① 威廉·洛甫克（1899—1966年） 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1937年以后在瑞士任教。——译者

虽然现在希望而且有必要淘汰无效用和不合格的企业设备，但是这种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新陈代谢可以用较少的花费借助反自由主义的联合会和卡特尔价格政策来进行。如果人们不能同时在这个方面决定进行干预，那么这种比较有利的作用也必然化为乌有。用这些措施取得的假自由当然是相当棘手的，即使这种不正常的利率根据假设的估计只是暂时现象。这种贴现政策的最早的后果将是：强迫造成的库存变卖并伴有削价而且因为出口增加而重新让外汇涌入。应该在哪个方面进行成本补偿以消化信贷涨价因素，这对一般的经济观察是尤为重要的。在当前工业品价格政策的操作中，人们首先就想到削减工资，因而继续扩大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距。无论如何都可以认识到，即使没有上述论证中的错误结论，这种自由也会产生相当危险的作用。提高利率又会特别迅速地将囤积的货币推回到流通之中去，这种假设也只是一种希望而且还取决于社会的不信任感到底扎根有多深。当10%的贴现率不足以把外国资本套在德国市场上时，就要问一下，高于15%的比率是否合适。当17%~18%的信贷成本还不能阻止需求时（因为在10%的贴现率时除了费用之外，银行汇兑也达到此等高价），也要考虑高于20%的费用是否非常充分。但是这里有一种危险，即如上所述，接受这种信贷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因而也就无助于银行的清偿能力。大量企业倒闭的危险从这种关系上看肯定是十分紧急的，而且这种作用对我国经济必然造成多大影响，这无需赘述。部分所要求的20%的货币利率在品质上已经不能再当作利率；它完全达到标准货币的估价，因而由此产生的后果可能与我们按照高利率的机械功能所设想的大相径庭。这里还有一点没有考虑。这就是：假若让抵偿极限低于银行法中规定的30%，那么再假定我们完全一致地认为这个步骤对货币毫无意义，我们就永远不了解外国将对这个现象作何反应。伦敦会议意义上的延期偿付财团似乎还没有组织完好并得到巩固，以致这个方面再没有危险威胁我们了。

总而言之，以贴现率继续大幅度增长为代价来恢复货币与信贷的自由市场环境，乃是一种大胆的冒险。新成立的“承兑和承保银行”在最佳情况下可以保证各机构之间的所有银行业务毫无技术障碍地运行；它无法改变这些现象本身或者减弱其影响。但是应该承认，假若没有其他的出路，那么我们也只得同意这种政策。

让我们回顾一下一般总是相当稳固的金本位制中的最薄弱环节——黄金准备条例。例如这个严格的框框根本没有考虑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支付习惯，这就说明了，这项法规多么不严谨。这项条例的内容还和 1914 年的完全一样，虽然现金需求按经济规模来测算在战前要大大少于实行金本位的时期。这段时间的转账货币流通量相反地也相对来看却得到比经济发展大得多的增长。国与国之间，经济上的现金流通量也是不同的，而黄金准备条例不必迎合这种差异。这就是说，而且这也并非什么争论问题了，支付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纸币流通的规模，因而金本位制各国的立法机关应对逻辑上的矛盾负责，如果他们只承认纸币的货币特性而且只从数量上调节这种特殊货币来保障币制的话。转账货币，存款货币，这种就其本质而言和纸币无异的货币，却在货币法案中没有受到重视。因此有必要再次强调，通货膨胀的原因与货币流通量毫不相干，而真正的原因仅仅在于直接或间接地得到收入而没有经济上的回报。每个经济主体只能一次性使用他的收入，至于采用什么技术手段，这无关紧要。这主要决定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传统的支付习惯。

金本位在这方面也有空子，这正是我们可以用来满足我们当前需要的，而不触及法制上的偏见。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支付习惯，那么才可行。只要非常坚决地承认非金本位中的存款货币往来、划汇转账业务为货币流通，那么我们就能够通过大规模的普遍的划汇转账而用最小的黄金储备推动任何庞大的经济机器，而又不触犯货币法，因而也不损坏信誉。